

【闲读随笔】

读《南方盟史拾零》

□散木

在书场上,有些书似乎毫不起眼,薄薄的,混夹在排山倒海般的众多书籍中,如果不是读者有心,它们往往寂寞地躺在角落里。

最近淘得的一本书,就是这样一本小册子。是关于历史上广东民盟的史实,书名《南方盟史拾零》(群言出版社2010年版),作者谢炎。作者是当年沧桑鼎沸时在广东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的,后历任民盟澳门分部、民盟中山分部、民盟广州市分部、民盟广东省委等要职,直至离休。因其经历,广东民盟在历史上的许多重大场景,他或置身其中,或知情较深,而在其晚年尤致力于南方盟史的研究,先后出版有《粤盟鸿爪》(香港拓文出版社)、《落红护花:苏伯的故事》(群言出版社)、《铁骨忠魂:彭中英的故事》(中共党史出版社)等,这本《南方盟史拾零》则是以其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南方(含东南亚地区)民盟的历史做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尤其吸引人眼球的则是当年广东民盟反右派运动期间的许多往事。

如今,历史研究已逐渐向共

和国史延伸,而中国的各民主党派萌芽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时期,并且在抗战中有了蓬勃的发展,最终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并在历史发展的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应该说,所谓民主党派都是讲民主、爱祖国的,并且与共产党长期通力合作、互相支持。然而后来在历史的坎坷中,过度阐释的“阶级斗争”理论使得党派必须对应所谓阶级属性的问题,而民盟也被认为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的一个资产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进而在剑拔弩张的政治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许多悲剧。《南方盟史拾零》讲述了建国初期广东民盟先后发生的“江门事件”和“中山事件”,这是当时轰动全国的两个事件,前者最初是由党内个别领导人的作风问题引起的,但很快就转变为民盟江门组织与中共的矛盾,转变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江门市委犯了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的大是大非问题了,直至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为此还成立了特别专案组,由刘少奇亲自过

问,甚至亲自审批,而省委统战部长饶彰凤因此也受到了处分。

此后,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广东民盟的反右成果,是其各级组织的实际负责人中除了中山民盟黄华键一人被划为“中右”而不戴右派帽子以外,其余统统被划为右派分子或极右分子,而所有这些人人都有一条共同的“罪状”：“贯彻章罗联盟恶性大发展的方针”。对此,作者发问：“究竟广东民盟在1956年到1957年这一段时间的发展组织工作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历史已经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了吧!”以上的史实,尤其是其中许多细节的展示,如果作者默而不言,也许就沉入大海矣。

《南方盟史拾零》还讲述了广东民盟一些领导人的遭遇,如郭翹然、张文、钟平等。作者称:在那些不同寻常的岁月中,几乎所有盟员都经历着被斗或斗别人的痛苦,其中有的人经历了既斗别人又被别人斗的双重痛苦。这些特殊记忆中的感触,恐怕非新生代的读者所能体会的了。如其中的一个个案:广东省民盟机

关被定性为极右分子的第一个人钟平,他在被揪出来后,又被追查如何组织右派集团,然而钟平毕竟是经过旧社会坐牢的磨炼,是有长期地下革命斗争经验的,于是他对如何应付群众对他的批斗有自己的一套,即在承认自己是右派的同时也承认自己拉帮结派,组织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不过,他的交代却很有分寸,那就是凡是未被揪出来批斗的,即便是他很要好的朋友,他都不承认是他小集团的成员;如果是被公开定性为右派分子了,即使是一面之交,他也常常咬死是他小集团中的一分子。作者认为,当时钟平认为反正你都是右派分子了,集团不集团,对你的命运也没多少影响,你就来和我“风雨同舟”吧,从而又造成了更多的冤案。

历史往往是沉重的。换言之,历史又往往并非是如烟往事,有了这些记忆,这些痛感,历史才能迈开大步往前走,让历史的阴影消遁在背后的烟云中。(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浙江大学教授)

【书人书话】

邓云乡和他的

《文化古城旧事》

□智效民

15年前我去黄山游玩,绕道去上海拜访了邓云乡先生。我记得他住在离复旦大学五六站地的一个宿舍小区。那是上世纪90年代比较流行的一批筒子楼,进门以后,厨房、卫生间、客厅、卧室,像火车皮似的排成一溜,给人一种转不过身来的感觉。

拜访邓先生的原因,是读了他的《文化古城旧事》。这本书由中华书局出版,以文化随笔的形式介绍了从1928年到1937年北京的各种情况,包括教育设施、文化环境、社会氛围、百姓生活、教授趣闻、学人轶事等。这些内容都是非常鲜活而又比较罕见的社会史资料。

除此之外,我喜欢这本书还有一个私人原因。自从进入90年代以后,因为不满意日益僵化的学术评价体制,我开始醉心于随笔写作,我从中尝到了读书写作的乐趣。但是,根据学术圈的游戏规则,只有论文才是评职称、涨工资的依据,随笔则是难登大雅的雕虫小技。如果你胆敢违背这些“军规”,则无异于自我流放。可以说,正当我“压力山大”缺乏自信的时候,邓云乡先生的这本书给了我很大勇气。

1990年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简直就是一座分水岭。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好像在精神上失去支撑,在生活上日益窘迫。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摆地摊的,有卖馅饼的,真可谓琴剑飘零,斯文扫地。对于这种现象,人们只能用“远看像逃难的,近看是社科院的”等顺口溜发泄不满。

大概是有感于此吧,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中详细介绍了当年北平的物价情况和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他说,那时候大学教授的工资是每月三四百元,一年就是四千元左右。这个数字相当于40两黄金的购买价。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他对当年的物价也有详细的介绍。比如一块大洋可以兑换250个铜子,一个铜子可以买一枚鸡蛋,两枚铜子可以买一个烧饼,三块大洋可以请一个佣人,30块大洋可以租一辆包车……

这些描述勾起了谭其骧的回忆。谭先生在该书序言中说:他当年虽然是个“教零钟点,戏称拉散车”的兼职讲师,每月不过数十元收入,但是日子也是过得有滋有味。其他方面且不必说,单说业余生活,就有吃馆子、听戏、逛书摊、上公园等四大爱好。即使如此,与藏书数万册的大学教授们还是远远不能相比。他还说:在这样的环境中,文化人的事业、情趣和爱好,决不会因为经济压迫而受到影响,其心态、思想和人格,也不至于被窘迫的生活所扭曲。所以,生活在这里的知识分子们,只要愿意多读点书,“也就不想再到南京、上海这些地方去争名夺利,站在斗争的风浪口去拼搏了”。

我原来以为江浙一带的文化人之所以喜欢北京或曰北平,主要是因为夏天不太热,冬天不太冷(因为室内有火炉)的缘故。看到邓、谭二位先生对老北平的介绍与回忆,才知道丰厚的收入、低廉的物价、悠然自得的生活、丰富的文化积淀,才是他们不愿意返回南方的真正原因。

在《文化古城旧事》中,邓先生还介绍了大学教授鲍文蔚的情况。他说此人是中法大学教授,不仅住着带盥洗室的小独院,还有自己的包车,雇着两个女佣,就连厨外出买菜也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让人们非常羡慕。

日前我上网查了一下,才知道当时鲍文蔚与邓云乡都住在位于西黄城根的陈家大院。这个大院的主人陈壁曾担任过清朝邮传部尚书。此公为官清正,因推行兴利除弊的改革措施而影响到权贵们的既得利益,所以被革职罢官。辛亥革命后,他返回北京,将自己的住所命名为苏园。陈1928年去世,而邓、鲍两家可能是1930年以后入住的,不知当时这个园子是否换了新的主人。

我当年拜访邓云乡的时候,并不知道鲍文蔚的底细。后来才发现他是一个传奇人物。此公是江苏宜兴人,因为与潘汉年是同乡挚友,所以年轻时在上海参加过中共的外围组织和地下活动。抗日战争开始时他留在北平,致力于中法文化交流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查封了中法大学,他的生活陷入凄惨的境地。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在多所大学教书。1955年潘汉年被捕,受牵连的数以千计。只因潘在口供中说鲍是一个比较顾家的人,才让他躲过一劫。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著有《长袍与牢笼》)

【书与人生】

11岁的梦想拯救了我

□孙云晓

知道我写了很多书,并且多次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或讲演,85岁的老父亲很是感慨地说:“我原来以为咱们家的坟头上不长文化的苗呢。”

用积极心理学的观点看,老父亲的话属于典型的习得性无助,即把难以在文化方面发展视为不可改变的根由。但是,我完全理解老父亲,因为他在山东桓台县老家勉强读过三年小学,因为家境贫寒,作为长子,他14岁就只身一人到青岛打工,属于农民工中的童工,一辈子当工人。

屋漏偏逢连阴雨。我年仅5岁时,29岁的母亲因为疾病加饥饿去世。后来,虽然有了一位慈爱的继母,可是贫困如乌云一样依然笼罩着我们这个五口之家。因此,我11岁之前,几乎没有看过任何课外书,更没有读过什么文学名著,倒是早早学会了上山割草、下海挖蛤蜊,成了捕鱼捉蟹的行家。

1966年的冬天,我11岁,正赶上“文革”最疯狂的潮头。我稀里糊涂地成了一个红小兵,跟着红卫兵去“破四旧”,多次闯入“有嫌疑的人”家里搜查,见旧书旧字画就烧,简直变成了一个小魔鬼。

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我的命运。

当时,我哥哥在青岛一家厂办技术学校读中专。有些工人闹革命,把图书馆里许多书扔到院子里,准备当“大毒草”烧掉。那一年我哥哥15岁,也是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可是,他却忍受不了文学的诱惑,竟然偷了一书包回家,有滋有味地看了起来。

我与哥哥住在一个房间,睡在一张床上,他看书怎能不诱惑我呢?于是,一个红卫兵与一个红小兵,在窗外一片造反声中,专心读起了“封资修的黑书”。有时候,为了避免被父母发现,我们哥俩还躲在被窝里用自制的手电照明夜读。

长到11岁,这是我头一回与名著亲密接触,头一回吃文学大餐。在我记忆中,这批书中有《三国演义》、《水浒传》、《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红岩》、《苦菜花》等。几个月后,这些书读完了,我已经上瘾,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于是,我就到亲戚朋友家找书读。人家看见我这么渴望读书,只好把家里藏起来的书拿出来。记得那个时候,我看了《红楼梦》、鲁迅的《故事新编》等许多书。

虽然许多内容看不太懂,但读了太多的文学名著,美的巨浪震撼了一个无知少年的心灵。于是,从11岁开始,我痴痴地做起了文学梦,梦想当一名作家!

说文学梦拯救了我绝非危言耸听。文学梦把我从文化沙漠引向文化绿洲,把我从野蛮之人变成文明之人。因为文学是人文,所以,我虽然还是红小兵后来成为红卫兵,亲眼看见许多学生打老师,我却坚守了不打人骂人的底线。

读书与写作是分不开的。我从15岁起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今天,已经写了40多年,几乎没有间断过。我16岁开始了疯狂的文学创作,19岁发表第一篇作品。

1978年我23岁,天赐良机,我被选派到中央团校学习。结业后,我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去某中央机关工作的机会,而选择了去中国少年报社做记者。理由很简单:我喜欢孩子,喜欢写作,喜欢文学。

在中国少年报社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工作成就了我的梦想。我31岁出版了第一本文学专著,33岁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在已经出版了几十本文学和教育日书。其中,1993年发表的关于中日少年《夏令营中的较量》引发全国教育大讨论,20年后依然是值得思索的沉重话题。

回首往事,我感受最深的是,人要敢于向所谓的命运说不,不屈服,不低头,只要你拥有并且坚守自己的梦想,即使经历坎坷伤痕累累,也会获得心灵的自由与幸福。

我与哥哥一直关系很好,我视他为恩人,因为我的读书习惯是他“偷来的”。阅读已经成为我极大的乐趣和习惯。每到一城市,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书店。我经常出差、旅行,在我的行囊当中一定会放上几本书。有书在身边很踏实,坐几天车或赶上飞机晚点也不觉得烦躁。

我愿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忠告天下父母们,其实,文学是人生之学,不管孩子以后选择什么专业,走上什么道路,阅读都能使孩子内心宁静、充实。我甚至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读书能与中小学时代相比,中小學生读书不是读是吃,吃进他的肚子里,长成他的骨骼和血肉,长出人的精神。

(本文作者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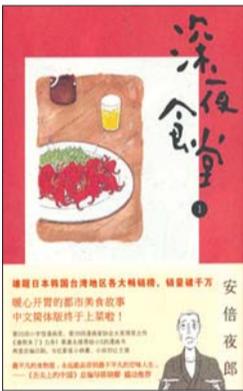
【编辑在读】

本期登场:姜士强



《公天下》
吴稼祥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始终难以逃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宿命”。如何跳出这个怪圈,实现幅员辽阔国家的政治稳定,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始终难以破解的问题。本书从孔子描述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谈起,结合有文字记载的真实史料,得出超大规模国家必然要走向“多中心治理”与民主政治相结合的道路。

《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
郎咸平 杨瑞瑞 著
东方出版社
在人们经常接触的学术作品中,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一个是由马克思思想理论孕育的社会主义,另一个是亚当·斯密理论孕育的以自由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本书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亚当·斯密同样反对垄断给工人造成的困苦,强调“看不见的手”,竟是为了破除政商结合导致的腐败。两人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主张不同的手段罢了。



《乡关何处》
野夫 著
中信出版社
在时代的车轮之下,每个人的命运都被牢牢地掌控,想要保持自我,却难逃历史的无情碾轧。本书的作者用12章的篇幅,在看似恢宏的时代背景之下,讲述了生活或曾经生活在他们身边的亲人、朋友的故事。作者用平白的笔触,描绘出一个或许已经被遗忘,正在被遗忘,却无法磨灭又悲凉烙印的真实世界。

《深夜食堂》
[日]安倍夜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个系列,日本作者笔下的漫画,故事的场景局限在一间只在午夜开放的小小餐馆。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出入,也带来一桩桩深藏于内的故事。读罢颇多感触,原来最平凡的食物里,永远能品尝到最不平凡的百味人生。即便是在最光鲜的人身后,也可能埋藏着极其痛苦的遭遇。深夜食堂,一个治愈心伤的地方。
(本文作者为本报评论部评论员)